

汉学研究应超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美]顾明栋^①

[摘要] 在汉学的跨文化研究中,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已经成为一种主导范式。但依据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对中国材料进行研究总有方枘圆凿、隔靴搔痒之感,因为,汉学本质上不是一种殖民话语。此外,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都以政治为导向、以意识形态为目标,极易陷入言人人殊的文化战争,既不能解决学术问题,也常常忽视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基本目的。对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种种问题进行反思,有助于超越其局限性,找到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

[关键词] 汉学;东方主义;后殖民理论;汉学主义;新范式

Sinological Studies Should Go beyond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Gu Mingdong

[Abstract] In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Sinology, the theories of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have evolved into a predominant paradigm, but research work on Chinese materials relying on this paradigm often makes one feel as though one were scratching an itching toe on the outside of shoes. This is because Sinology is essentially not a colonial discourse like Orientalism. Moreover, both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are politically oriented and ideologically driven, easily leading to culture wars of conflicting discourses, which frequently overlooks the basic goa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cholarship and cannot resolve scholarly controversies. By reflecting on the various problems of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in Chinese studies, we may transcend their limits and limitations and locate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which is Sinologism.

[Keywords] Sinology; Orientalism; postcolonial theory; Sinologism; paradigm

在汉学或曰中国学的跨文化研究中,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理论已经成为一种主导范式。东方主义理论虽然十分有用,但据之对中国材料进行研究总有

① 作者简介:顾明栋,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文艺理论。

方枘圆凿之嫌;同样,套用后殖民理论也有隔靴搔痒之感。赛义德多次重申他的理论是根据国内国际的政治而得出的。由于赛义德的理论主要探讨的是西方人(殖民者和学者)对中东文化的认识、观念和评价中所存在的问题,因此他的东方主义著述并没有关于被殖民者的只言片语。此外,赛义德的批评理论没有探讨被殖民者自身对于殖民文化的态度和看法。因此,有些学者诟病赛义德在其批评研究中让被殖民者缺席的不足是很有道理的。阿里夫·德里克对东方主义的批评就很有代表性:

我认为,赛义德所论述的东方主义的不足之处在于其疏忽了“东方人”参与有关东方话语阐释的地位,这一点会引起话语的地域问题,也因此意味着会引发有关权力的问题……虽然东方主义在其根源和历史与欧洲中心主义有紧密的关系,但在根本上,如果想要获得合法性,东方人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①

德里克正确指出了赛义德东方主义的一大缺陷:即它极少关注被殖民者在殖民心态和自我殖民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少关注葛娅特丽·查克拉芙替·斯皮瓦克所描述的“知识分子在同化他者过程中的同谋角色”^②。这一缺陷同样受到了其他后殖民批评家的质疑,其中包括霍米·巴巴^③、罗伯特·杨^④、齐亚乌丁·萨达尔^⑤、阿贾兹·阿赫迈德^⑥和其他的后殖民和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他们在自己的著述中对赛义德的理论进行了大量修改、补正和重新概念化的工作。后殖民研究也因此而超越了赛义德理论东方和西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关系,同时也拓宽了赛义德的视野。这对于跨文化的研究看似很有用处,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后殖民话语同样有其局限和缺陷。很明显的一点是:中国从未被西方完全殖民过。这一历史前提肯定会影响西方人和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社会的认知和看法。普通人和知识分子都会受到这一影响,同时他们的学术研究方法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另外一点与第一点相关:东方主义的母体(东方学)和汉学主义的母体(汉学)因历史原因在本质和功能上有所不同。如今,多数学者视东方主义为一种“殖民话语”,但很少有从事汉学研究的人会把汉学视为一种殖民话语。其原因很明显:他们是两种研究动机不同的学术活动。霍米·巴巴对殖民话语有一段简明扼要的描述:“殖民话语的目的就是把被殖民者视为一种因其种族根源而落后的人群,其目的是为征服正名,为统治和教导体系的建立铺路。”^⑦由此看来,汉学肯定不是一种殖民话

①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5, No. 4, (1996), p. 112.

② 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Vincent Leitch et al, eds.,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2010), p. 2114.

③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71 - 75.

④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127 - 140.

⑤ Ziauddin Sardar, *Orientalism* (Buckingham and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54 - 76.

⑥ Aijaz Ahmad,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London: Verso Books 1994), pp. 159 - 220.

⑦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p. 70.

语。因此,运用一种在完全被西方殖民的文化研究中推衍出来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知识生产中的问题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

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研究模式套用到中西研究中的另一大缺陷是:这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都是以政治为导向、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因而极易引发文化战争。文化战争对于解决学术问题无能为力,并总是无视知识和学术研究的基本目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不同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概念范式。目的就是要对如何进行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如何在尽可能不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干扰的情况下对有关中国知识生产等问题进行自觉的思考。

汉学研究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知性心态和学术习惯:即不管西方目的论模式和概念框架是否适用于中国资料,也不管研究资料所产生的历史和文化语境,研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照单全收。一些远见卓识的中国思想家与我持同样的看法。李泽厚多次批评1919年以后中国学界的主流趋势——很多人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把西方理论生搬硬套用来研究中国的资料,结果丢失了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把握。他于2006年指出:“自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从胡适、冯友兰到牟宗三,这些中国思想家都用西方的概念框架来谈论中国。这种学术研究的方法也不无成果:在阐明中国如道、气、太极、性、理等难以诠释的概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方法同时也抹杀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性。”^①

二十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何以不断生产有悖于中国文明现实的知识?自从鸦片战争(1839—1842)把中国带入现代世界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何以要么过度夸饰,要么自虐诋毁,而对西方学术知识理论、范式和方法要么顶礼膜拜,要么盲目地不屑一顾?世界上一些睿智的思想家和批评家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和社会所持的观点和评价何以近乎谬误,甚至黑白颠倒?通过观察中西方学者在诸多领域大量失真和歪曲的现象,我认为,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识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误读并非仅仅源于信息不灵、偏见歧视和政治干预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于一种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深层逻辑,而这种逻辑业已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和评价相互矛盾,就是这种文化无意识的必然产物。这种文化无意识是导致误读中国的核心因素,并已构成了一种涵盖广泛的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我称其为“汉学主义”^②。

汉学主义虽然也涉及东方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或族群中心主义的方方面面,但绝非它们的翻版。汉学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涉及的是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和中国的中国知识生产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现象。它与汉学这一集中研究中国的领域相关但却不同。可以说它是汉学和知识生产的一种异化形式,它以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涵盖了中西学术研究中的各种问题。

“汉学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有着两个核心概念。其一是“文化无意识”,它包含一系列次无意识:“智性无意识”、“学术无意识”、“认识论无意识”、“方法论无意识”、“种族无意

① 李泽厚,《实践美学发言摘要》,引自《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

② 笔者对汉学主义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参见笔者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刚出版的英文专著: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2)。

识”、“政治无意识”、“语言无意识”以及“诗性无意识”等。这诸多无意识组合而成的大范畴构成了汉学主义研究的概念性基础,它广泛涉及中西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并将汉学主义的认知与东方主义及后殖民主义区分开来。其二是“知识的异化”,笔者认为用这“异化”的概念足以描述汉学主义的本质和性状。就异化的知识而言,笔者把汉学主义视为汉学和中西知识的异化形式。“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这两大概念的结合构成了“汉学主义”概念框架的理论核心。根据这一概念核心,我们可以对文化无意识进行理论化,探讨汉学主义如何演化成为中西方研究中的异化知识。笔者认为文化无意识是汉学主义之源泉、动力,而汉学和中西方研究的异化知识则是汉学主义之结果。

基于以上的概念基础,我们可以提出一种中西方研究的新范式。这种潜在范式基于如下认识:汉学主义是一种在学术领域(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具有多元维度的知识产业,它受控于一种无意识的内在逻辑,这一逻辑通常生产异化的知识。汉学主义成为一种新范式的可能性,一方面在于它能为不同领域和学科的学者们提供新的视野和方法,使他们得以探索汉学主义在他们研究中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于它能把学者们从中西研究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桎梏中解放出来。

我们不应把汉学主义当做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提出来,而是要把它构建成一种自觉反思的学术批评理论。“汉学主义”研究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揭示对中国的偏见歧视,亦非为了纠正对中国文明的歪曲表述、驳斥对中国材料的误解误读。这些方面的分析研究相对容易,更为艰巨的任务当属在这些问题的表象之下和之后揭示其产生的动机、精神框架、态度和原因。“汉学主义”的研究的基本目标是寻找有关中国和西方学术研究中问题产生的内在逻辑。从概念上来讲,“汉学主义”的研究主要想揭示在“汉学主义”这一标题下产生的形形色色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其次,这种研究可以提高人们对文化无意识的认识,正是这种文化无意识导致了知识生产中问题的产生;也可以揭示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无意识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其中包括阻碍跨文化交流、导致认识论的惰性以及造成非西方民族原创力的萎缩等。其三,这种研究可以帮助厘清在汉学研究和中国研究中赛义德东方主义理论应用的一些学术问题。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研究可以激起涉及已有中国研究范式的可行变革,已有范式是建立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模式和伪科学目的论的基础之上的;新的研究范式可能给读者以灵感而找到中国知识生产的真正科学的方法。“汉学主义”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鼓励和促进相对中正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这种知识生产应远离任何形式的歧视、偏见、主观性和政治干扰。最后这一目标似乎有乌托邦之嫌,因为大家普遍认为知识是建构的结果,而真理,即便是自然科学的真理也难逃主观性的干扰。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即使真的没有绝对客观的知识,我们仍需提倡知识的相对客观公正性。否则,知识生产将退化为话语战争、文化战争,甚或意识形态战争,这将危及知识传播、恶化文化偏执、阻碍文化间的理解。更为严重的是,这会给萨缪尔·亨廷顿在他那著名论断中警告过的文明冲突火上浇油。^①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6).